

AI时代,文学何为?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胡萌

AI技术席卷而来,人类精神世界该如何安放?这是当下越来越多写作者思考的问题。日前,在“AI时代,文学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人生锚点暨鲁敏新书《不可能死去的人》分享会”上,作家鲁敏、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围绕时代语境下的文学价值、AI与写作的关系等议题展开讨论。其间,一个观点愈加明晰——在技术洪流中,文学所承载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深层精神追问,更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一个字证明自己不是AI

如果选一个字证明自己不是AI,你会选什么?这个火遍全网的短视频话题不断引发热议。鲁敏给出的答案是:“我”。“AI永远无法知道‘我’是谁,而每个人的‘我’,藏在每天说的一百句话里,藏在最后一页书里,藏在挑出的那根香菜里。”鲁敏认为,“我”的存在是人类最宝贵的本质,也是AI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无论写作还是阅读,本质上都是对“我”的唤醒与确认,“你读什么书,如何理解故事,都是‘你’的独特印记。写作时,我们用虚构描摹‘我’;阅读时,我们用经验参与‘我’,这个过程中,‘我’的存在感被不断强化。”

马兵认为,AI与人类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对个体经验的深层感知,“有人选‘妈’,因为AI没有母亲;有人选‘急’,因为AI无法体会人类真正的焦虑;也有人选‘慢’,因为AI只追求高效,不懂人的钝感与迟缓。”这些词汇都承载着人类独有的情感体验与生命轨迹,“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捕捉这些不可复制的个体体验,让每个‘我’都能在文字中找到共鸣与归属。”他说。

在技术主义愈发盛行的当下,坚守“我”的存在,尤为迫切。现实中有多例证:作家塞壬在《无车车间》中,记录了自己深入东莞工厂八十余天的打工经历,她笔下流水线的机械轰鸣、工友间的细碎寒暄,以及身处其中的肉体与精神消耗,都是浸润了亲身经历的私人表达,而不是AI仅凭资料就能复刻出的。还有人让AI模仿作家李娟的文风写阿勒泰的日常,AI能堆砌出草原、羊群等意象,却写不出她与牧民相处时的细碎温情,更无法传递那份扎根于生活的天真与怅然。

更重要的是,人从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过程中不断建立、打破、寻找自我,文学正是这场自我探寻的重要载体。鲁敏以新书封面设计为例,特意用不完美的手写体和朋友的即兴画作,对抗AI的完美技术主义,“用有缺憾的人力创作,呼应我们作为不完美人类的本质,这本身就是对‘我’的坚守。”

未完成的叙事

鲁敏的新书《不可能死去的人》以日常为底色,收录的中短篇小说凝结了她五年里关于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爱的教育,以及个体与共关系的微妙思考。很多故事的灵感都源自生活碎片,其中《不可能死去的人》就源于老家的真实经历——全村供养的优秀少年考上顶尖大学后意外离世,家人与村民们尤其是资助者不愿接受现实,便用谎言编织彼此慰藉的港湾,“美好的谎言是生活中互相疗愈的重要方式,也是文学传达善意与仁爱的途径。”鲁敏说。

在她看来,文学对日常的书写,关键在于细节的捕捉与意义的挖掘。“生活中那些让你心中一动的瞬间,才是文学的养分。”她以书中《味甘微苦》为例,没有亲生骨肉、担心无人送终的姨娘晚年常逛墓地,这里无需过多注解,隐隐表达出老人对孤独终老的担忧,对死亡的隐秘思考。

“每个人的日常都有自己的幽深面,芸芸众生都有不可言说的心事与坚持。”马兵评价,鲁敏小说的最动人之处,便是将共通的生命体验与个体的独特感相融,对人物内心的细腻描摹,让每个日常故事都独具张力,这也提醒创作者,莫要执着于激烈情节与戏剧化冲突,而忽略了日常本身的文学质感。

叙事方式上,鲁敏主张用“开放式结尾”调动读者参与感,这一理念也引发了对文学表达边界的探讨。《灵异者及其友人》中主人公对算命大师的逃离,《寻踪》中主人公和友人寻找记忆体的未知结果,都是她刻意留下的留白。“我愿意让读者用自己的经验调动想象,参与小说结尾的完成。你信命运,便会跟着主人公上楼见大师;你守自我,便会理解她转身离开后的选择——这便是文学的互动性,让文本在不同读者心中,生长出不同的模样。”

这种“未完成”的叙事,实则是另一维度的“完成”。马兵补充道:“《寻踪》中,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为了玻璃弹珠和牛马麻将闯入废墟的行为本身,已然完成了对记忆与情感的锚定。”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总能让“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平衡,不刻意用悲苦裹挟读者,让沉重议题在娴熟叙事中落地;也能从逛墓地、买盐水鸭这类细微日常里,挖掘出生命的重量。

文学对日常的书写,还应触及当代社会的新型关系。鲁敏认为,除了传统的家庭联结、书友、病友、跑友等因共同处境或媒介纽带形成的关系,同样值得深耕。“这些关系里,人们抛开身份标签,在某一维度达成深度共鸣,有时,网友的悼亡比家人更真挚。”

锚定人生的力量

在鲁敏与马兵看来,面对AI浪潮,人们既不必盲目欢呼技术红利,也无需过度悲叹人类表达的式微。“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探讨AI,反而忽略了自身的存在。吃一顿美食,吹一阵风,读一页书,这些真实的体验,都是‘我’存在的证明,也是文学对抗技术异化的力量。”鲁敏说。

而文学之所以能成为AI时代的人生锚点,更在于它敢于直面死亡、虚妄等终极命题,帮人们在困惑与困境中找到慰藉与方向。她认为,人类对死亡的天然好奇,本质上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关切:“我们通过关切死亡来感受生活,消化痛苦,正因为知晓生命有限,才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死亡、爱、时间,这些是文学永恒的母题,而文学的使命,便是在对这些命题的不断叩问中,让人们看清生命的本质,不再迷茫。

谈及“虚妄与美好”的辩证关系,鲁敏分享了自己的生命观:“生命本身是悲剧性的,我们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所有美好终将消逝,这便是虚妄的本质。但也正因为这份虚妄,一杯水的甘甜,一朵花的绽放,才更显珍贵动人。”她坦言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中的生活热爱者”,而文学,正是在虚妄中捕捉美好的重要路径,“以虚妄为前提,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生活的滋味,这也是文学能锚定人生的核心原因——它让我们在认清生命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海岱考古

□ 本报记者 卢星

在近日召开的济南市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上,“大明湖西南遗址保护”成为热点话题。

2024年春,济南考古工作者在大明湖畔的地铁建设勘探中,意外触及了一段深埋地下的夯土墙体。随着发掘深入,一段距今约42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墙及其外壕沟系统逐渐显露真容。

从空中俯瞰,大明湖西南遗址与现代城市肌理形成奇妙共振。那些曾深埋地下的古国文明先声,终将以崭新姿态激荡在城市血脉中。



大明湖西南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墙。

水井促进早期城市繁荣

“这一发现将济南的建城史,从过去普遍认为的约2700年,大幅向前推进了约1500年,至4200年左右。”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俊峰在考古现场介绍。他指着一处探方剖面解释道,地层清晰显示,从大汶口文化层开始,历经龙山、岳石、商周、汉、唐、宋等时期,文化堆积连续不断,“这证实了济南古城区范围内,人类活动至少延续了5000年且未曾间断,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一个鲜活例证。”

回溯时光,早在16年前,龙山文化的实物遗存便已悄然现身,为今日的重大突破埋下了伏笔。

早在2010年底,为配合贵和天地广场的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在天地坛街遗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遗址位于天地坛街与黑虎泉西路交叉口西北部,此次发掘位于建设区域西南部和东北部,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深度达4米多。此次发掘虽未揭露大规模的建筑遗迹,却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等古代遗物,其中相对完整以及可复原的陶器、瓷器、玉石器等各类文物40余件,器型主要包括陶鼎、陶罐、陶瓦当、陶纺轮、瓷碗、瓷杯、瓷瓶、小瓷俑、铜钱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地坛街遗址发掘区东北角最下层,出土了龙山文化时期夹砂红、褐陶片若干,以及陶鼎与陶罐等。这是济南第一次在古城区内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年—4000年)的实物遗存。

可见,那时先民在济南繁衍生息并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济南文史研究专家张继平说,每一块陶片,都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随着对这些实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古代济南人民的生活方式、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特点。

“城墙以东为城内,出土的生活遗迹很多,除了龙山文化堆积外,战国、宋代一直到现代的遗迹都有,可见这个区域是具有连续性的生活聚居区。城墙两侧的古井值得特别注意,在约200平方米的区域密集分布着13口水井,从龙山文化时期开始,战国、宋代、明代、清代的都有,充分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这个区域就已经是聚居区了,而且居住人口数量较多,具有一定的规模。”郭俊峰说。

要知道,水井的产生,是人类用水的第一次“革命”。从此,人们可以摆脱水对人们居住地选择的限制,从而离开河流、湖泊,走向更加广阔的原野。

山东目前发现时间最久远的水井,是济宁市张山遗址发掘的距今7000年左右的水井,属于北辛文化时期。这口井的椭圆形井口,中部较大的腹径以及平底设计,均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其次,在广饶县傅家遗址发现两个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水井(距今5000年左右)。虽然山东地区很早就开始挖掘水井,但发现数量很少。水井的大规模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目前许多龙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水井。

考古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井的发明、推广和早期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解决了城内居民、手工业生产者、家畜和兴建工程的各种用水问题,人们无需从城外获得生活、生产建设 and 饲养家畜所需要的水,从而促进了早期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这么多的古井,从4000多年前到数百年前的都有,也说明这个区域地下水一直充沛,能够满足当时的人群饮用。”郭俊峰说,“这些古井遗迹,提升、丰富了济南泉文化的内涵,对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有积极意义。”

“古国林立”的历史格局

大明湖西南遗址中,除水井彰显着泉水特色,城墙遗迹作为考古发掘的最重大的成果,更凸显了济南不断流的文明基因。这段城墙位于发掘区东端,在发掘区内南北长22.5米,两端分别向南北延伸至发掘区外,宽约28米,残留最高处距地表2.4米,残存高度约6.4米,为人工层层堆筑而成。考古人员还对城墙内采集的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加上相关出土文物,确定为距今4200年左右。

郭俊峰回忆起城墙的发现过程,称其“充满曲折”。勘探初期,因地表建筑复杂,后期淤积深厚,并未立即判断为城墙。是考古人员对零星发现的夯土块保持高度敏感,并通过后续土方发掘,才将散落的夯土连接起来,最终确认了墙体的存在。



出土的明清时期文物。

从聚落形态学的视角审视,城墙的出现彻底重构了人与时空的关系。如此规模宏大的城垣工程,显然需要大量劳动力长期协作。推测当时以济南龙山城为中心及其周边聚落的居民,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这项浩大工程;而要组织、调度如此庞大的劳动群体,并有效指挥工程建设,已远超传统氏族社会的治理能力,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机制——国家权力正在形成。

大明湖西南遗址所揭露的龙山文化城墙,其意义远不止于一段夯土遗迹,它是一道划时代的界碑,标志着济南地区先民正式跨入了以“城邦”为基本单元的复杂社会形态,开启了从平等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宏大历史进程。在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已出现多个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古国”,呈现出“古国林立”的历史格局。

这一历史进程是如何实现的呢?山东地区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明显。龙山文化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随着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多,包括对人在内的社会财富的掠夺不断升级,掠夺和战争已经非常频繁,这些现象都是此前氏族社会未曾经历的。

而维持城内秩序、保障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转,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城乡矛盾,分配耕地、兴修水利等大型公共事务,均已无法依靠固有的氏族制度来完成。此外,保卫城内及周边乡邑、村落的安全,也需建立专门的常备武装力量——这种军队的组织与指挥体系,更是氏族社会难以想象的。

上述种种变化催生了高大坚固的城墙,因为其既可以抵御外敌入侵,还能防范内部被统治阶层的反抗。“筑城以卫君”——即保护统治集团的安全——成为龙山城池的重要功能之一。

此外,在大明湖遗址所揭露的龙山城周边,应该还分布着数个聚落遗址。这些有待后续考古工作来印证。这些聚落相当于都城之下的“邑”。都城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各“邑”的首领,对更基层的乡村聚落实行管理,形成了“都—邑—

聚”的三级社会结构。这种层级分明的聚落体系,是龙山文化进入古国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王国文明的前夜

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经达到1500余处,发现遗址的数量接近大汶口文化的三倍。大汶口文化前后有1500年,而龙山文化延续的时间仅600年左右。由此数量对比,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人口和社会的迅猛发展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地区多处龙山古城被发现,说明山东是古国文明重要的发祥地。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栾丰实根据聚落的分布规律推测,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城址至少在20座以上。以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除分布于苏鲁海岱地区的两城镇、丹土、尧王城和藤花落等城址外,鲁北山前平原地带的边线王、桐林、丁公、城子崖,使徒河流域的景阳冈,沂河畔的毛官庄,以及薛沙河流域的庄里西等城址也已得到确认。

专家分析,龙山文化的城市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一般相距25公里至50公里。这可能反映当时一个城市所能影响的范围,也有人认为是当时一个古国的范围。从大明湖遗址的龙山城往东30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那是龙山文化最初发现地。

这些城址作为区域性的中心聚落,通常在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控制着少量次级中心聚落和大量基层村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单元。各城址之间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可称之为“城邦”。随着龙山文化中后期城址的普遍出现,海岱地区各地逐渐被大大小小的城邦所占据,构成了海岱龙山文化极盛时期独具特色的社会景观。

这些城市的出现,在当时并没有消灭掠夺和战争,随着集团力量的增强,战争进一步升级。为了共同的利益,相近族团之间不断组成新的联盟。在中原地区,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联合。随着联盟的加强,建立在上古文明之上的王国文明就应运而生了。中国史进入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时期。

由此,从社会发展阶段看,龙山文化时期是古国文明时期,是王国文明的前夜。而考古资料显示,大明湖西南遗址在岳石文化及战国时期曾多次进行补筑和修缮,说明其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并未中断。这与文献记载中周初时期的“浞邑”“历下邑”地理位置高度吻合。

从4200年前龙山先民夯筑城墙,到战国时期济南先民的修补加固,大明湖西南遗址所揭露的龙山城址见证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学界和大众对早期中国城市起源、国家形成机制的理解,也为“泉城”文化增添了更为深远的历史维度。



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土的陶轮,因造型及功能特殊,成为龙山文化时期的明星文物。

龙山城墙：激荡古国文明先声

石虽无语 马却长嘶

数珍贵文物的肌理之间。作为汉代石刻艺术的精华,画像石犹如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其中奔腾不息的马,更是鲜活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力量与风华。

当我们凝视收藏于邹城博物馆的东汉胡汉战争画像石,耳畔仿佛骤然响起金戈铁马的嘶鸣。这块宽近三米的画像石并非静止的图案,而是一场被瞬间凝固的沙场风暴。该画像石出土于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石纵约0.82米,横约2.79米。工匠采用弧面浅浮雕技法,让画面在光影下产生近乎戏剧的动感。而这一切叙事的核心与灵魂,正是姿态各异的战马。

画面分上下两层,情节如连环画般展开。上层,溃败与追逃正在上演:四匹战马驮载骑手向山间逃窜,一骑失足坠马,惊恐之态惟妙惟肖,应为被俘胡人。战马身后紧随三名士卒,右侧两骑立马待命,队列末端以五名士卒收束。下层凸显战事胶着:左侧两骑乘马格斗,战马交错,前蹄蹬地,尽显骁勇;右侧三

马牵引辎车,旁有一马驾辕辎车随行,构成后勤队列;辎车之后,两骑策马殿后,仿佛这场流动戏剧的压轴注脚。

这里的马不仅是坐骑,更是情绪的载体、战术的节点。整幅石刻以马为脉,连缀起格斗、奔逃、行军之景。其线条凝练而意气纵横,无疑是研究古代战争与民族关系的无价瑰宝。

如果说东汉石刻中的马是“力”的化身,那么另一件出自西汉的伯乐相马泗水取鼎建筑人物画像石,则集中体现了马所承载的“智”与“道”。该画像石出土于邹城市郭里镇卧虎山,石体纵0.84米、横2.79米,采用阴线刻技法,以左、中、右三格布局分述不同故事。

左格刻双阙,阙上立双鹤,阙下有骑士执戟而左,两侧卫士躬身。右格上层为四坡顶建筑,栖鸟对话;下层为泗水取鼎图,绘众人取鼎,龙跃鼎倾的生动场面。中格为画面核心:上层是车马出行图,下层即为“伯乐相马”主题。骏马居于正中,身姿健壮挺拔,双耳直竖,

头戴璎珞,昂首挺胸,目光如炬。左侧伯乐头戴进贤冠,身形微躬,一手持节,一手握缰,气度沉稳;相马人九方皋则俯身探视马口,闭目凝神,专注于辨识马的内蕴。骏马后方有二侍者执杖扶剑,衬托此马之珍贵。上层车马出行与下层相马情景相互呼应,共同凸显了马在汉代社会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伯乐相马的故事载于《楚辞》《庄子》《列子》等典籍。将这一场景刻于墓室,既是对典籍文化的尊崇,也寄托了时人祈愿——愿墓主在往生之后,仍有神骏为伴,驰骋仙境。

这两幅画像石,一武一文,一动一静,皆以马为魂。战马见证烽烟,骏马承载典故,共同镌刻下汉代深沉而辽阔的马文化记忆。石虽无语,马却长嘶,透过斑驳石刻,我们仍可听见历史深处传来的蹄声与嘶鸣。

扫二维码观看视频



文物志



胡汉战争画像石拓片(局部)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李莉

2026年是农历马年。中国人对马的热爱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马文化深深烙印在历史年代的军事、经济与政治脉络中,流淌在无数

